

# 中国古代捶丸发展与演变的考古学观察

## ——兼及古代体育史有关研究方法的思考

崔乐泉<sup>1,2</sup>

(1.上海体育学院 中国武术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8; 2.国家体育总局 体育文化发展中心, 北京 100061)

**摘 要:** 从近年发现的考古文物资料出发, 结合既往学者对历史文献记载的探讨, 对中国古代捶丸的发展与演变进行考古学分析。研究认为, 由步打球、棒击球发展而来的捶丸活动, 迟至宋代已在社会得到广泛开展; 延至明朝中期, 捶丸从宫廷至平民百姓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普及和传承; 明朝末年开始, 在自身特点和多重社会因素的影响下, 具有竞技性特点的捶丸逐渐消失在人们视野之中。但由其独特的运动特点和规则分析, 中国古代捶丸与诞生在西方的高尔夫球, 应当有着某种密切关系。

**关键词:** 体育史; 捶丸; 步打毬; 棒击球; 高尔夫球; 中国

**中图分类号:** G81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17)01-0058-06

### Archaeological observ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huiwan

#### ——Also a thought about research methods in relation to ancient sports history

CUI Le-quan<sup>1, 2</sup>

(1.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Wushu,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2. Sports Culture Development Center,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 of China, Beijing 100061, China)

**Abstract:** Starting with the information of archeological relics found in recent years, coupled with previous scholars' exploration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records, the author carried out an archeological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huiwan,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Chuiwan developed from batting-on-foot and stick-and-ball had been extensively developed as late as the Song dynasty. Until the mid Ming dynasty, Chuiwan was popularized and inherited to different extents among officials in palaces and civilians. Beginning from the late Ming dynas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multiple social factors, Chuiwan with competitive characteristics gradually disappeared from people's sight.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its unique move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ancient Chinese Chuiwan had a certain close relation with golf born in the west.

**Key words:** sports history; Chuiwan; batting-on-foot; stick-and-ball; golf; China

捶丸, 中国古代球类活动形式之一, 由于其独特的形式和规则, 使其在中外古代体育发展史上产生重要影响。多年来, 不少学者对这一活动形式做过分析, 但鉴于近年来大量相关考古资料的发现, 使得我们对捶丸本身的发展与演变, 又有了一些新的思考。为此, 本研究拟根据近年考古发现的有关资料, 在分析文献记载的基

础上, 对其在中国古代的发展与演变进行探讨, 以有益于学界对这一古代球类活动形式更为全面的了解。

### 1 捶丸活动的出现

捶丸, 击打球丸之意。在元代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出版的署名为“宁志斋”编著的《丸经》一书

收稿日期: 2016-07-05

基金项目: 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体育项目志(汉民族部分)”(10&ZD129); 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体育文物调查与数据库建设”(15ZDB146)。

作者简介: 崔乐泉(1959-), 男, 研究员, 教授, 博士, 博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 体育史。E-mail: lequancui@163.com

中，首次出现了“捶丸”一词。在这本专门论述捶丸著作的集序中，作者留下“至宋徽宗、金章宗皆爱捶丸”的记载。宋徽宗在位时间为建中靖国元年至宣和七年(1101—1125年)，这就表明捶丸的出现不会晚于北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

“捶丸”一词虽然在北宋徽宗宣和七年之前已经出现，但作为一项体育活动，它的特点已经在之前的诸多球类活动中有所体现。在蹴鞠发展兴盛期的汉代，因马匹的广泛应用，由二者结合而产生的马上杖击鞠活动，曾在唐朝达到极盛<sup>[1]</sup>。但为了使这一活动适应于各类人群，同时也为了适应女子参与球类活动，在击鞠发展和普及的基础上又演化和拓展出了骑驴以杖击鞠的驴鞠和徒步以杖击毬的步打毬，而步打毬则在唐代发展成为一种休闲活动形式。这在考古发现的资料中，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的形象描绘。如在甘肃瓜州榆林窟中唐第15窟南壁壁画，就遗留一幅儿童步打毬图像。图中如车轮般大的莲花上站立一位两脚前后开立，右手执顶端弯如半弦月球杖，左手执球的儿童。其形象表现为曲膝、上身前俯，欲作抛球击打的动作(见图1)<sup>[2]</sup>。同样的考古文物资料在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李仙蕙壁画墓<sup>[3]</sup>、日本奈良正仓院<sup>[4]</sup>等都有发现和收藏。



图1 唐代步打球壁画

及至宋代，驴鞠和步打毬常常见于时人的休闲活动中，成为当时娱乐以及节日仪式中不可缺少的表演和休闲竞技性内容。而在步打毬基础上产生的以棒击球的活动方式也出现了，并广泛流行于宋元时期的不同阶层中。在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玄孙范纯仁曾孙范公偁<sup>[5]</sup>写的笔记小说《过庭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滕甫元发……爱击角球，(范)文正每戒之不听。一日，文正寻大郎肄业，乃击球于外。文正怒，命取球，令小吏以铁槌碎之。球为铁槌所击(一作激)，起中小吏之额。小吏护痛间，滕(甫)在旁拱手微言曰：‘快哉。’”这种不易被击碎的“击角球”活动，就是当时社会上常见的棒击球形式。

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考古文物资料，对当时流

行的棒击球活动更有着形象的描绘。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一幅宋人绘制的《蕉阴击球图》册页和陈万里《陶枕》一书著录的二件宋代“儿童棒击球图陶枕”，使我们对于宋代的棒击球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宋人绘制的《蕉阴击球图》册页为故宫博物院藏品，纵25cm，横24.5cm。画面中，庭院内湖石突兀而立，后面隐现数丛茂盛的芭蕉。在湖石的前面，少妇与身旁的女子正专注观看二儿童击球。其中一童正手持木拍(棒)欲坐地击球，另一童则向他焦急地喊话。画面中四个人的目光均落于儿童所欲击打的小球体上<sup>[6]</sup>。陈万里《陶枕》一书著录的二件宋代“儿童棒击球图陶枕”，一件为儿童手执一个勺形球棒在下蹲击球；另一件为儿童手执一种类似后世高尔夫球金属杖头的球棒在站立击球。画面构图简洁，突出主题，清新优雅(见图2)<sup>[7]</sup>。



图2 宋童子捶丸图陶枕

广泛流行的步打毬和随后出现的棒击球，由于不需要借助任何畜力就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活动的特点，因而普及面更广，更加适宜于不同人群，尤其是妇女的参与。特别在活动中增加击球入窝的内容后，使其竞赛对抗的形式更具特点。这类球类活动形式除名称之外，其使用的器具和活动方式已基本具备了后世捶丸的特点，而捶丸应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的<sup>[8]</sup>。

形成后的捶丸活动方式和特点，在《丸经》一书中做了全方位的总结和说明：捶丸的突出特点是场上设球窝(穴)，用球杖击球；捶丸活动的场地多设在野外；捶丸活动时所用球杖有“撻棒”、“杓棒”和“朴棒”等不同的形式，以供球手在不同条件下使用时打出不同特点的球；捶丸用球为生长不规则且纤维绞结紧密的赘木(树瘤子)制成，因其坚固而长击不坏；捶丸比赛过程中，既有分组比赛，也有不分组而各自为战的。一般以参加人数的多少而分为大会(9~10人)、中会(7~8人)、小会(5~6人)、一朋(3~4人)和单打(2人)等。赛前每个击球者可以领取牌筹，每人每场5筹。比赛中根据筹码的多少，有大筹(20)、中筹(15)和小筹(10)之分，而最终胜者是先得以上各数者。另外，《丸经》一书还

对捶丸活动中的一系列惩罚条例作了说明<sup>[9]</sup>。

捶丸活动在宋代正式出现后,于社会上逐渐得到广泛的开展。在整个宋元时期,上至宫廷、下至平民百姓,都对这项球类活动情有独钟。但由于这一活动本身的独特运动方式,在不同的时期,其流行的范围、流行的人群以及表现出的特点也不一样。

## 2 民间捶丸活动的普及

虽然“捶丸”一词正式出现在北宋晚期,见于《丸经》对捶丸活动方法和规则所做全面、完善的记载与总结分析,这项活动在此之前就已经在社会上广泛开展了。与此同时,《丸经》一书出版时,正是南宋被元王朝灭亡,横跨欧亚大帝国正在形成的时代。当时的社会,“天下隆平,边睡宁谧,将帅宴安囊弓服矢之际,士卒嬉游于放牛归马之余”<sup>[10]30</sup>。太平盛世为休闲娱乐提供发展的优越环境,而流行多年的捶丸方法、规则于此时以著作的形式统一、出版发行,正迎合时代的要求,也间接证明这一活动形式是在流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基础上逐渐完善的。

由于捶丸活动是由普及于民间的步打毬和棒击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流行起来的捶丸运动,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尤其是在民间,捶丸逐渐成为青年男女休闲娱乐性体育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

2002年8月,山东泰山岱庙西城墙修复工程中出土一批宋代石刻画像,其中一幅高近30cm的画像,其主题是反映当时儿童进行捶丸活动的形象。儿童高约23cm,上着束腰长袍,下穿肥腿裤。头上雕饰别于两耳后的发髻和捆扎的软巾,右手持球,左手上举持棒。儿童所持球棒自上而下逐渐变细,棒端为弧状弯曲,这应该就是捶丸中的“杓棒”。击球儿童双唇紧闭,两眼紧盯右前方,一幅全神贯注的模样。这幅石刻捶丸图,以其传神的形象,向我们描绘了宋代民间儿童进行捶丸活动的情景,它所体现的历史价值、史料价值,弥足珍贵(见图3)<sup>[11]</sup>。



图3 宋代儿童捶丸石刻

元代,捶丸活动在民间更为普及。在元杂剧《百花亭》第二折中,就有专门描绘青年男女聚会时参加捶丸活动的情景:“折莫是捶丸、气球、围棋、双陆、顶针续麻、拆白道字、买快探阉、银筝搦,白苎讴、清浊节奏,知音达律、磕牙声嗽。”<sup>[12]</sup>捶丸和踢球、下棋、打双陆、唱歌、听音乐、说笑调侃等,都是元代青年男女聚会时喜爱的休闲娱乐活动,而捶丸则列于首选。

在与宋代同时存在的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辽代国土上,捶丸活动在当时也逐步流行。1972年辽宁省朝阳县前窗户村辽墓出土的“童戏纹鎏金银大带”上,就有儿童捶丸的图案。大带共出土五块,其中小者四块为正方形,大者一块为长方形。四周皆有折缘边框,框内采用焊接、铸印、锤蹀等工艺各装饰一组包括儿童捶丸、弄风车以及舞蹈在内的活动图案。其中儿童捶丸图案位于大带框内左下侧,两个儿童各手执一捶丸棒,正全神贯注地盯着被击起的丸球,生动地刻划童子们多彩的体育游戏活动<sup>[13]46</sup>。

明代,捶丸活动仍在民间流行。在传世的文物中,有一件明代“玉捶丸童子”,该童子以白玉雕成,周身饰以花纹,其右手正执一弯月形捶丸杖,足后附雕一圆球丸,表现了童子进行捶丸活动前的情景<sup>[13]41</sup>。在明朝文人李诩所著《戒庵老人漫笔》一书中,曾专列《休闲选胜各八》一章,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8种休闲活动方式做了描述,在这8种休闲活动中就包括有捶丸一项。李诩还同时对捶丸活动的8种技巧做记载,这8种技巧分别是“卧棒斜插花,燕尾斜插花,后概掀过前,前概翻过后,背身正棒,两肩基儿,雁点头,背身倒卷帘”<sup>[14]</sup>。这8种技巧在《丸经·制器章》中也有着描述,但对每种技巧的具体操作方式至今难以作出合理的解释。不过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捶丸活动仍然在民间流行的事实。

由于捶丸的“丸”、“杖”制作材料与方式越来越具有专业性和较高的要求,使其在明代后期逐渐失去了在普通民众中流行的基础。同时,随着尚武的满清贵族进入中原后,对骑射狩猎、滑冰和摔跤等传统体育形式极力提倡与推广,导致捶丸这一“高雅”的休闲体育活动于明末清初已经很难在民间见到。

## 3 流行于上层社会的捶丸活动

作为一项高雅的休闲体育活动形式,捶丸在兴起后即成为颇受上层社会欢迎的项目。现存陕西省甘泉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宋代富家子弟捶丸纹画像砖,就形象描绘了捶丸活动在上层社会的盛行情况。画像中雕有官宦装束的两位捶丸者,曲膝、上身前俯,共同握一顶端弧弯的半弦月形球杖。整幅画面表现的是右边一人正在指

导左边一人如何击球。这一画面表现出宦人家子弟在学习捶丸技艺的情形(见图4),反映出宋代的捶丸活动已经在上层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



图4 宋代捶丸纹画像砖

元代的捶丸活动在上层人士中更为常见。考古工作者曾在山西省洪洞县水神庙神大殿的墙壁壁画上发现一幅绘于元代的捶丸图。捶丸图的背景为一深山峡谷,捶丸的场地就位于峡谷之中。在上空彩云浮动、地面草木丛生的场地旁边,有一条流水涓涓的小溪。场地上有两位身着红袍的官员打扮的捶丸者,正手持球杆进行捶丸活动。两人的身后,都有一位持铜锤而立的年轻人。图中左起第1人半蹲,左手按左膝,右手以横棒击球。左起第3人手拿球棒,等待打他的下一棒。左起第2、第4两位均着淡兰色衣服,衣角挽起,手上各拿一铜锤。其中第2人还用手指向球窝,为击球者指明击球的方向。这两人似是两位击球官员的侍从,也可以说是击球者的“伴当”。这幅捶丸图反映捶丸活动在元代的官员中间是一项很时尚的休闲运动形式<sup>[15]</sup>。

由于捶丸得到上层人士的普遍喜爱,以致在当时的许多文学作品中,常常成为描绘的对象。元代散曲作家张可久<sup>[16]</sup>有一首小曲《南吕·金字经·观九副使小打》,其中曲词这样唱到:“静院春三月,锦衣来众官。试我、花、张、董四擗。搬,柳边田地宽。湖山畔,翠窝藏玉丸。步款莎烟细,袖慳猿臂搥,一点神光落九天。穿,万丝杨柳烟,人争羨,福星临庆元。”曲词中说,参加捶丸活动的有庆元路(今宁波地区)的“锦衣众官”,还有地方绅士“我、花、张、董”4人。捶丸的地点是在宦人家的“静院”中,此地临着“湖山畔”,又有“杨柳烟”,一个十分幽静的地方。元人王和卿<sup>[17]</sup>也有一首《为打球子作》的散曲,其中有“出凤城闲游玩,选取高原胜地面,就华屋芳妍,将步鞠家风演”的描述,而参加上述捶丸活动的多是“列俊逸五陵少年,簇豪家一代英贤”,他们都是社会上富豪

和贤良人士。元代诗人张昱曾作一首《辇下曲》,其中有“闲家日逐小公侯,篮棒相随觅打球。向晚醉嫌归路远,金鞭稍过御街头”<sup>[18]</sup>之句,曲中的小公侯带着拿“篮棒”的“闲家”去打球,说明元代官员在休闲时喜爱的活动就是捶丸。

元代的捶丸除在官吏士绅中成为受人喜爱的休闲体育活动,在皇宫中也颇受欢迎,是皇帝愿意看也愿意参加的活动。元代著名诗人萨都刺<sup>[19]</sup>在其《春词》中描绘到:“深宫尽日垂珠箔,别殿何人度玉笋。白面内官无一事,隔花时听打球声。”这里说的“打球声”便是指捶丸。明代杂剧作家朱有炖<sup>[20]</sup>在其《元宫词》中亦描述说:“苑内萧墙景最幽,一方池阁正新秋。内臣扫净场中地,宫里时来步打球。”这里的步打球,实则为徒步击球,元代已没有步打毬,这里的步打球说的应是捶丸。

发展至明代,捶丸活动也是官员贵胄们喜爱的运动休闲项目。明人周履靖在重刻《丸经》的“跋”中说:“予壮游都邑间,好事者多尚捶丸……若将帅之答升平,士君子之消暇日,习坐作进退之式,察击捶胜负之机,推而致之,触类而长之,抑亦收放心,怡神情,动荡血脉,畅其四肢,岂博弈者所能企其万一者哉,宜乎君子不器而取友以同乐之。”<sup>[10]34</sup>捶丸是将帅在升平无战事时的休闲娱乐活动,更是雅士君子的休闲内容,依此可以健身、怡情,是六博、围棋等消闲娱乐不能与之相比的活动形式,君子都是以此和朋友相聚共同参与。

李开先<sup>[21]</sup>是嘉靖朝的高官,因受朝臣排挤,40多岁便辞官回归章丘故里。此后便以写诗、编剧消遣度日。《闲居集》中就收录有其描写捶丸的《打球》诗:“安基齐燕尾,如射中鸿心。柄过窝难挂,球轻体却沉。得入手朴棒,妙处线穿针。胜负俱休论,忘情岁已深。”李开先还特意在这首诗下做了注解:“详见《捶丸集》。”说明其所说的“打球”便是捶丸,捶丸也是李开先退休后消磨岁月的休闲娱乐活动。

明代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所描写的主人公西门庆是依靠钱财买官,仗势欺害良民而起家的。其生活享乐虽然腐化却附庸风雅,经常仿效士大夫,以下棋、投壶、行酒令等作为其娱乐活动,其中就包括捶丸。书中第三十五回写西门庆派家人张安去买赵寡妇家的庄子和土地时说道:“若买成这庄子,展开合为一处,里面盖三间卷棚,三间厅房,叠山子花园、井亭、射箭厅、打球场,耍子去处。”<sup>[22]</sup>这里所说的“打球场”便是捶丸的场地,此正如李开先的诗题《打球》一样,表明明代人一般俗称“捶丸”为“打球”。这段话的意思表明,西门庆要在郊外建一处可以供自家娱乐的别

墅,在这个别墅里有花园、假山、射箭厅,也有包括捶丸场的大院子。

明朝著名画家杜堇画有一幅《仕女图》,在其中表现仕女捶丸活动部分,绘制由平整的草坪,并有茂盛的青松树衬托。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左右两侧各有一位丫环打扮的充当“伴当”的角色。在她们中间有 3 位高绾发髻的仕女,正在进行捶丸活动。其中左侧的仕女两手执棒,做出对前方不远处丸球欲要击打的姿势;而右侧的两位仕女,正在俯身持棒做出静心观望的神态。这幅绘画展示捶丸活动在明代仕女当中流行的情景<sup>[13]48</sup>。

除官僚士绅,明代皇帝也对捶丸活动钟爱有加。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幅明代宫廷画师商喜绘制的《宣宗行乐图》长卷,图中按照不同的段落,分别对明宣宗朱瞻基于宫中参加击鞠、蹴鞠、射箭、捶丸、投壶等休闲体育活动的情况作过描绘。画面中多数情况下都是朱瞻基高坐在黄幄里观看他人比赛,唯有捶丸和投壶两个项目,是朱瞻基亲自执棒、执箭参与其中的。在捶丸部分,朱瞻基使用的球棒,被一根根分门别类竖立在特制的球台上。两位各捧着一根推杆,小心翼翼的太监守候在旁边。而主角明宣宗朱瞻基则左右手各执一棒,正在琢磨以哪种棒击球最为合适。其面前的“伴当”则正在指指点点,似在参谋如何打球。图中的球场草皮平服妥贴,并置有数个球洞,每个球洞旁各插有不同颜色的彩旗作为提示(见图 5)<sup>[13]47</sup>正是由于捶丸是一种高雅的休闲型体育项目,活动量小且健身效果好,又能“收其放心,养其血脉,而怡怪乎神情”<sup>[10]30</sup>,并有修德悦心的功能,所以这一运动形式不只是官吏士绅的休闲内容,也是皇帝喜爱、亲身参加的活动。



图 5 明代商喜绘《宣宗行乐图》长卷局部

#### 4 捶丸活动的沉寂与演变

捶丸活动形成后,在元、明两代度过一段轰轰烈烈的兴盛期。但由明朝末年开,由于其“曲高和寡”

的特色越来越浓厚,除以其变通的纯娱乐性休闲形式在文人儒士、风流男女中间偶见之外,作为一种竞技性项目已经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与捶丸活动逐渐走向娱乐化的同时,其在社会上的流行价值也在逐渐减弱。尤其是当满清贵族入主中原,建立大清帝国之后,其民族习俗中勇武的传统体育活动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对所谓优雅休闲式的捶丸等中原传统体育活动则很少加以提倡,以致捶丸活动逐渐失去贵族士大夫阶层的喜爱,逐渐受到冷落。这样一来,逐渐失去开展基础和流行环境的捶丸活动,就在向娱乐游戏演变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沉寂。

在捶丸消失 200 多年之后的 19 世纪末期,来自西方的高尔夫球传入中国(见图 6,中国体育博物馆藏品)。随着这项现代体育项目在中国的普及和人们对其了解的逐渐深入,许多学者开始将捶丸这一中国古代的球类运动形式与高尔夫进行对比分析。经过对比研究,捶丸与现代高尔夫的关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技术上,捶丸与高尔夫都置有球洞,前者叫窝,后者称穴。两者都以杖击球,且球杖形制区别不大;在场地选择上,捶丸所用地形有凸、凹、峻、仰、阻、妨、迎、里、外、平等特征。高尔夫球场则是在平坦的场地上特意配置有凹凸粗糙不平的地段,并设有沙洼地、水沟等障碍物;在传播渠道上,公元 1218—1260 年间,蒙古大军在三次西征基础上建立横跨亚欧大陆的蒙古帝国,通过西征,将以前闭塞的欧亚路途完全打开,并藉此将中国古代文化传入欧洲。在这一文化传播过程中,中国古代捶丸很有可能通过这一途径传入欧洲<sup>[28]</sup>。但这仅仅是历史推测,不过从两者的密切关系看,中国古代捶丸和诞生在西方的高尔夫,应该有着某种密切关系。



图 6 近代彩绘白瓷女子打高尔夫球茶壶

#### 5 由本研究引申出的有关古代体育史研究方法的思考

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自 19 世纪末维新运动开启以来,一直崇尚中国传统的研究模式。从 1902 年梁启

超<sup>[24]</sup>发表《中国之武士道》，到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国第一部体育史专著——《中国体育史》<sup>[25]</sup>，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世界体育史略》<sup>[26]</sup>《世界体育史纲要》<sup>[27]</sup>，再到建国以来出现的大量体育史研究成果，古代体育史研究多倚重传统史籍的相关资料。近年来，随着体育史学研究中交叉学科和理论方法的介入，在古代体育史研究成果中已经出现诸多用以作为“佐证”的相关考古文物资料。但由于考古文物知识除了对其本身的年代、质地、功用、来源和价值的了解，还需要关注其属性和名称的界定，而这也是考古文物资料引入古代体育史研究必须予以重视的。因为考古学是一门综合学科，无论考古发掘，抑或对馆藏或传世文物资料的整理，专门的考古研究者多由其主题特征的角度做出分析(包括文物定名和属性分析)，而对其表现出的附带特征或作用，往往忽略不计。但相对于古代体育史研究者来说，对被引入并加以“佐证”的相关文物资料，必须进行更全面和专业的分析，以便确定其是否具备“体育文物”的要素，这是事关古代体育史研究方法的关键。通过本人近年来所做的相关研究和本研究的主题分析，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相关考古文物资料的介入，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古代体育史甚至世界古代体育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而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对考古学知识的深入了解和掌握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因为这既涉及考古文物资料能否被正确介入古代体育史研究，更涉及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结论能否得到正确、无误的“佐证”。

### 参考文献：

- [1] 唐豪. 中国古代的马球运动[J]. 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 1959(7-8): 61-96.
- [2] 李重中, 李金梅. 丝绸之路体育图录[M].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8: 图 360.
- [3]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J]. 文物, 1964(1): 7-33.
- [4] 井上勝純. ゴルフ事始、その神秘的な起源[J]. 大塚薬报, 1998(3): 9-20.
- [5] 范公偁. 过庭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27.
- [6] 郑振铎, 张珩. 宋人画册[M]. 北京: 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 1959.
- [7] 陈万里. 陶枕[M]. 北京: 朝花美术出版社, 1954: 28.
- [8] 翁士勋. 体育篇[G]//黄金贵. 中国古代文化会要. 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7: 755.
- [9] 刘秉果, 张生平. 捶丸——中国古代的高尔夫球[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21-26.
- [10] 陈梦雷. 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弄丸部·丸经·序[M]. 蒋廷锡, 校订. 北京, 成都: 中华书局, 巴蜀书社, 1985.
- [11] 刘慧. 泰山岱庙出土石刻中所见的童戏图[J]. 民俗研究, 2006(3): 144-146.
- [12] 臧晋叔. 元曲选(第四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1432.
- [13] 崔乐泉. 中国古代体育文物图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14] 李翎撰. 戒安老人漫笔[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110.
- [15] 柴泽俊. 广胜寺水神庙壁画初探[J]. 文物, 1981(5): 图版 4.
- [16] 张可久. 南吕·金字经·观九副使小打[G]//隋树森. 全元散曲(下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754.
- [17] 王和卿. 为打球子作[G]//隋树森. 全元散曲(上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28.
- [18] 柯九思. 辽金元宫词[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8: 7.
- [19] 萨都刺. 雁门集附录[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20] 朱有墩. 元宫词一百首[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8: 111.
- [21] 李开先. 李开先集(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86.
- [22] 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词话[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30回.
- [23] 王小甫, 范恩实. 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217-218.
- [24] 梁启超. 中国之武士道[M].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6.
- [25] 郭希汾. 中国体育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19.
- [26] 章辑五. 世界体育史略[M]. 北京: 勤奋书局, 1932.
- [27] 程登科. 世界体育史纲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45.